



2

李敖

蒋介石评传

李敖作品

JIANGJIESHI PINGZHUAN

绑鸭子上架的北伐
国共和谈因何破裂的史实
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
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内幕

②

李汪
敖荣祖
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2008

本
方

2

蒋介石评传

JIANG JIESHI PINGZHUAN

2008.1 出版
9787309060000
16开 320页
32.00元

①

作者：王健
译者：王健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蒋介石评传

JIANGLIESHI PINGZHUAN

汪荣祖
李敖 著

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介石评传/汪荣祖 李敖著.-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4.7

ISBN 7-5057-2018-X

I.蒋... II.汪... 李... III.蒋介石(1887~1975)-评传
IV.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8271 号

责任编辑:孙以年 黄志平

书名 蒋介石评传(上、下)

作者 汪荣祖 李敖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

规格 880×1230毫米 32开本
23.75印张 520000字

版次 2004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000册

书号 ISBN 7-5057-2018-X/C·304

定价 48.0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合同登记号:图字01-1999-1519

第七章 蜀中无大将

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

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,都说抗战前后,汪精卫是主和的、是妥协的、误国的;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、是抗日的、爱国的。其实,在许多情况下,事实正好相反。

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,就以“跳火坑”的心情,处理国事。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,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、受闲气。

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,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。自此以后,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,出卖华北利权;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,打击抗日分子;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,使华北特殊化,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。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,都是汪精卫。事实上,汪精卫本人,对日本原是主战派,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、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、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,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,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(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),一度忍无可忍,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,因此出国。据陈公博《八年来的回忆》:

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,而且兼了外交部长,我当时大不以为然,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。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,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,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:

上海的淞沪协定为“汪先生”所知的，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，汪先生也应该分辨一下。汪先生说：“绝不分辨，谁叫我当行政院长？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。”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。

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，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，主了和以后，还要汪精卫追认。

陈公博的回忆，告诉了我们：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，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！蒋介石这种性格，甚至他的把兄黄郭有时都气不过。沈亦云《亦云回忆》中收有黄郭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电报，其中责备把弟说：“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‘共尝艰苦’之旧约，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，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，疑爱国者为弟（指蒋介石），误国者为兄（黄郭自称）也。”（页四九二）——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郭都如此，又况汪精卫乎？事实上，当时汪精卫的处境，正是扮误国的角色，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，代演衬托的苦戏耳！

据陈公博回忆：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，始于一九三三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。这次战事，“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，都说官兵无法战争，官兵并非不愿战，实在不能战，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，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，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。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，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”。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，他益发认为“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”，否则一旦开战，只是便宜了苏联。

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，国事在形式上

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,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,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,引起举国哗然。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,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,在开幕典礼拍照时,汪精卫被击三枪。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,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,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,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,激于“九一八”以后不抵抗的耻辱,决心牺牲个人,除蒋救国。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,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,毒性将定时发作,乃一不做二不休,退而求其次,向汪精卫开了枪。蒋虽幸免,汪却替蒋挨了枪。(参阅蔡德金《汪精卫评传》页二二八至二三一)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,冤枉了蒋,然而毫无疑问的是,汪与蒋合作,不仅替蒋背了黑锅,还挨了枪。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!

西安事变之后,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之后,中国全面抗战,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其实,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,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,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,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。

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三日分别约见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法国大使,希望西方强国调停。其实早于七月十九日,英国外相艾登(Anthony Eden)为了英国在华利益,宣布已与美、法两国联系,并通知南京与东京,愿意斡旋。(见 Friedman, British Relation with China, P. 93) 七月二十八日,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,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(Dodds)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,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。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,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(The Times, 10 August 1937),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。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,经

蒋介石

由驻美大使王正廷,要罗斯福总统调停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(Grew)遂向日本外相表示,如有必要,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。(参阅 Department of State,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: Japan, 1931—1941, Vol.1.P.435)但是日方,尤其是日本的军方,根本不欢迎英、美介入。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,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,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,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。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,德国顾及对华关系,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,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,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。(参阅 Fox, Germany and Far Eastern Question, P.233)七月底,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(Ernst von Weizsacker)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(Oskar Trautmann):“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,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,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。”(美国务院编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, 1918—1945, 1:P, 742, 743, 参阅 P.748)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,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。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: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,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。(见陶德曼报告,载 German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, 1:P.741, 748)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,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。

日本侵华,军方最力,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。广田外相曾于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,导致八月八日,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。日方提出:一、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,中日军队各自撤退;二、不侵占领土;三、不赔款。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,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。(参阅《东京战犯审判纪录》,Exh.3260)然而八月九日却发生“大山

事件”，最后引发“八一三”淞沪之战，谈判自然流产。

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，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，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“德日反共协议”来影响日本，德方回答是否定的。（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，载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, 1: P. 741, 742）接着于八月二十一日，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，并于九月九日向国联提出申诉，国联遂于十月初召集会议，但广田于十月二十一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，惟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，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。（见德国驻日大使 Derksen 致德国外交部，载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, 1: P. 769—770）一周之后，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（Herbert von Derksen）提出：“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。”（同书，页七七三）陶德曼遂于十月三十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，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。不久，于十一月三日，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，由德国转达。七条件重点是：一、内蒙古自治；二、华北设非武装区，委派亲日首长，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；三、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，由国际警察管制；四、停止排日，修改教科书；五、共同防共；六、减低日本货进口税；七、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。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，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，有和平诚意，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。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。十一月五日，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车至南京晋见时，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，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，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。蒋介石又说：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，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，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。陶德曼

说：“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：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。”（前引书，页七七四）

可是，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，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，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，同时安阳失守。十一月八日，太原失守、任县失守。九日，淞江失守。十一日，上海失守、大名失守。十三日，济阳失守。十四日，嘉善失守。十六日，昆山失守。十八日，嘉兴失守、烟台失守。二十日，苏州失守。二十一日，吴兴失守。二十四日，布鲁塞尔会议闭幕，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，促中日双方和谈，中止战争，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。日本照样进军，二十五日，无锡失守、长兴失守。二十九日，宜兴失守、武进失守。三十日，溧阳失守、广德失守。十二月一日，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（Baron von Neurath）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：“为中国利益着想，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，还是尽速议和为好。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，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。”（美国国务院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, 1918—1945, P.787）十二月二日，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，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。各将领问：日本有无旁的条件？徐谟说：据陶德曼所说，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，并无别的条件；如能答应，便可停战。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，唐生智还没答，又转问白崇禧。白崇禧说，只是如此条件，那么为何打仗？徐谟说：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。蒋介石又问徐永昌。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，可以答应。又问顾祝同，也说可以答应。再问唐生智，也赞同各人的意见。蒋介石就表示：一、德国调停不应拒绝，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；二、华北政权要保存。——蒋介石显然慌了。那天下午五点，他接见陶

德曼，“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”。另表达两点：一、中国深望：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，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；二、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，必须维持其完整。这就是说：一、一切结果，要请德国人背书，德国人不要放手；二、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，东北也不要了，内蒙也不要了。最后蒋介石要求：“必须强调提醒日本：在谈判完成以前，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。”（参阅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》第六编，页一一三）这显然是丢不起人，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。

蒋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约见陶德曼，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，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：一、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；二、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；三、德国自始至终调停；四、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。（见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, P.787—789）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“毅然许诺”后，转报回国。德国外交部认定“日本的建议，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”，遂在十二月七日，转告日本。可是，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，气焰特甚，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，表示怀疑（见同书，页七九九），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。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失守。

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，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，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。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，重点是：一、中、日、满（满洲国，即中国东北）共同防共；二、设立非武装区，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；三、中、日、满经济合作；四、对日本赔款。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，不停止军事行动，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

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。这种条件,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,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。(见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, P.804) 德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会日本,此种结果将无助于“反共产国际协议”。(见同书,页八一—)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,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,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,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,则将与地方政府媾和。(参阅同书,页八一—、八一—、八一—)尽管如此,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,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,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,向陶德曼说:“经过适当的考虑后,我们觉得,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。因此,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,以便仔细研究,再做确切的决定。”(见同书,页八一—至八一—)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,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,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,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,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,此即日本首相《近卫文磨声明》,宣称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。(见《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》第二册,页三八六至三八七)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,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。至此,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。事实上,德国调停虽然结束,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。

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,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,如萱野长知(一八七三—一九四七)、小川平吉(一八六九—一九四二)、头山满(一八五五—一九四四)、秋山定辅(一八六六—一九五〇)等。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,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,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,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,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。

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，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，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，由柳云龙、杜石山(又作石珊)负责。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，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，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“指导”，全盘都是蒋门作业。

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，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，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，曾电请头山满“主持正义，力挽狂澜，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”。同年三四月间，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本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，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秘密见面商谈，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，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。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，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。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，尊重中国主权，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，中国原则上同意，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。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，觉得孔有诚意，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磨。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“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，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，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，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，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。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(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)到港相助，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。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，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，未为日方接纳。一时之间，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，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。

约当此时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户。(参阅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，页二一二至二七三)高氏日本之行，论者每想当然，

李
秀
文

以为奉汪精卫之命,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,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(Gerald E. Bunker)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,论定高直通蒋介石,“绝非汪之代理人”(Kao in no sense acting as Wang's agent)。(见 Bunker, The Peace Conspiracy, P.75, 80)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“日本问题研究所”为名的情报机关,暗中与日方联系。三月二十七日,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,飞往汉口,于四月三日提出报告,并于五日晨“晋謁委座”。四月十四日,高自汉飞港,“负有秘密使命也”。(《周佛海日记》上册,页七十八、八三十)据西义显《悲剧的证人——中日和平运动秘史》说,蒋介石要高氏转达:“东北与内蒙问题,可留待他日再谈,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,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,日方应予尊重。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,则先行停战,再行谈商细节。”五月三十日,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,当时已任宣传部部长的周佛海,把他送往陈布雷处。(《周佛海日记》上册,页一〇六)六月五日,高又“奉命飞港”。六月二十五日,梅思平謁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,“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”。(同书,页一一六)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,汉口已知之,汪、梅、周尚需“推测”,证明高奉蒋命,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。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,七月六日,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,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,前往南京,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,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,东北可以割让。(张有谷《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八辑,页一四一至一四二)

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,没有马上报命,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:“闻宗武返港数日,迄无消息,布兄亦无所闻。”(页一二六)显因日方仍

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”之故，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，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，“送其报告呈委座”，没有讳言“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”，周氏也表示“失望”。（见同书，页一二七）第二天，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，见蒋“打不起精神”。没过几天，周就听说，蒋令“王亮畴（宠惠）托英、美大使，设法由英、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，或向中、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”。（同书，页一二八至一二九）《蒋总统秘录》说，高宗武“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”（页二五五八），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。蒋于失望之余，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。

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：“与隆庠谈半小时，嘱其明日赴港，转达一切。”转达什么，虽不知道，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，如不与蒋为对手，非要蒋下台不可，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。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，而是继续在港、沪两地与日方交涉，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，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。

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，日方虽仍要蒋下野，然而若蒋决心“铲共亲日，媾和尔后有办法”。所谓办法，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，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，“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，当亦无妨。”（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》（一），页五九六）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，与孔祥熙在军艇上晤面的计划。至此，日方实已修正了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的主张。九月二十五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，与蒋介石、孔祥熙详商。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。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，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，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。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，国府即将投

降,无须发表撤兵声明,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“国贼”,反对和议。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辞去外相职务,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。(参阅杨天石《寻求历史的谜底》,页六〇八至六一〇;施乐渠《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,页六十五至六十七)

日本军阀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汉,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,号召“继续贯彻持久抗战”,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。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,并不如军方所想,中国会投降。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,久战不决,增强了媾和意愿,梅思平也有了成绩。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记,颇堪玩味:

(梅)思平由港来,略谈,即偕赴汪公馆,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,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。(页一九四)

这个草稿,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,“善邻友好、共同防共、经济提携”三原则的声明(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,全文见《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》第三册,页四〇七)。发表前将近一个月,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。蒋、汪既然都主和,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。蒋、汪的争执绝非主战、主和之争,蒋之不愿附和,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,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。当蒋坚持不肯,汪乃决定脱离重庆,自由表达和平主张,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,在舆论上造势,逼蒋走向谈判桌来。